

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文丛

熟悉的陌生人

——村落视野中的传播、
交往与互动

孙信茹 ● 主编

民族出版社

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文丛

熟悉的陌生人

——村落视野中的传播、交往与互动

孙儆茹◎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熟悉的陌生人：村落视野中的传播、交往与互动 / 孙信茹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4

(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丛书 / 郭建斌主编)

ISBN 978-7-105-14884-4

I. ①熟… II. ①孙… III. ①少数民族—村落—民族文化—文化传播—研究—中国 IV. ①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2358号

熟悉的陌生人：村落视野中的传播、交往与互动

策划编辑	彭素娥
责任编辑	赵莹
装帧设计	刘海伦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pub.com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1.75
定 价	31.00元
书 号	ISBN 978-7-105-14884-4/K · 2595 (汉1465)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010-58130104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云南大学“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创新团队建设成果

云南大学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创新团队建设项目（社科）”资助

“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文丛”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 编 郭建斌

副主编 杨绍军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亚南	韦 平	孙信茹	杨绍军	杨星星	张静红
陈静静	金晓聚	单晓红	徐明卿	郭建斌	曹云雯

文丛总序

自 1997 年云南大学新闻系单独建系以来，就把“民族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主要方向。当时这样一个方向的确立，并非我们对传播学研究的未来有某种“先知先觉”，而是和云南大学整个学校的学科建设重点密切相关。民族学是那个时候云南大学文科学科发展的重点，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不少非民族学的学科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民族学靠近。

云南大学新闻学专业是 1984 年设置的，1985 年招收第一届本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云南大学新闻学专业就在本科课程中开设了传播学课程。这与云南大学新闻专业的第一任教研室主任高宁远有着直接的关系。高宁远老师 1956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来到云南工作，1958 年被划为“右派”，2006 年 7 月 22 日不幸去世。1994 年底，高宁远出版了《新闻传播基础理论》一书，从该书的内容框架来看，它已经与同时代国内出版的新闻学理论的教科书有较大的区别，书中出现了很多传播学的概念，如“信息”“传者”“受众”等。讲这方面的情况，并非要去强调云南大学新闻系传播研究的“悠久历史”，而是要讲在传播学进入中国内地不久，作为这样一

所边疆大学一个新办的新闻学专业，与传播学相关的内容在教学、教材中就有了具体体现。

恰巧就是在云南大学新闻系单独建系的1997年，新闻传播学在中国升格为一级学科。那个时期，就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情况来看，主要还处于译介阶段，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现实所开展的研究还不多见。因此，在建系之初，我们所开展的第一项立足于本土的研究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这项研究属于传播研究中的“发展传播学”的范畴，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合作，研究得到了云南省“省院省校合作项目”的资助。项目于1998年底立项，1999年全年都在调研，2000年成果出版。这样一个匆匆完成的项目，存在诸多的不足，但是这项研究也算是当时国内立足于本土所做的一项规模较大的实证研究。

这样一项研究，无疑是和云南大学新闻系当时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方向相吻合的，但是，在实施这个课题研究时，我们自己对于“民族”“传播”这样一些概念的理解，更多的是一种简单的借用，并未在学理层面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同时，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于量化研究的方法、理解和运用都还不是十分熟练。现在来看，这样一项研究最大的价值在于让我们走出校门，关注社会，关注云南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的区域文化。

进入21世纪之后，云南大学新闻系的同仁在研究方向上和此前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在研究取

向上不知不觉地转向了人类学的民族志。2001年，后来成为云南大学新闻系教师的孙信茹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她的硕士学位论文。该论文入选2002年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研究生论坛”，并在论坛上获得好评。2003年，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云南大学新闻系教师郭建斌在云南怒江贡山县独龙江乡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题为《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的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是国内新闻传播学科第一个用民族志的方法完成的博士论文。据我们了解，当时国内也有一些西部地区的高校把“民族传播”作为自己学科建设的方向，但是在当时，在这样一个宽泛的概念之下明确地使用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成果在一定范围内被国内新闻传播学界认可的，似乎还没有。

2009年8月，云南大学新闻系与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共建的“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在云南大学举行了揭牌仪式，恰逢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在云南大学举行。虽然研究所的成立与这一学术盛会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不是这样一项国际学术会议的一项内容，但是在内在逻辑上，这两者之间有关联。

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成立之后，当年就得到了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的项目资助，在此项目的基础上，相关的课题又在2010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这样两个研究项目，在某种意义上再次把云南大学新闻系的学术

力量凝聚在一起，如同1999年开展的项目研究一样，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凝聚力的“学术共同体”。

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成立之后，做的另外一件事是着手国内第一套“媒体人类学译丛”的翻译工作，译者也主要是云南大学新闻系教师，该译丛至今已经出版3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所以想到翻译这样一批“媒体人类学”的著作，是因为我们感觉到西方“媒体人类学”的研究和我们目前所从事的研究之间有很多的关联，而国内人类学界对此关注的还不多，更为重要的是想通过这样一套译丛的翻译、出版，给国内新闻传播学科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学生提供某种借鉴。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云南大学新闻学专业开设传播学课程，到1999年开展第一项具体的实证研究，再到本世纪以来转向人类学方向，最后有了一个具体的学术平台。我们从一般意义上的传播学的讨论，最后落实到了传播研究中的一个具体方向——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在这样一个具体的研究方向上，是有研究成果支撑的。除了以前产生的学术成果之外，现在我们又有机会以“研究文丛”的形式来展示我们的学术成果。

这个“文丛”所收录的内容，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云南大学新闻系教师近年来较新的研究成果，共5本。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又分项目成果和博士学位论文两类。就项目成果而言，包括前面说到的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资助的项目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相

关的项目成果还有其他的，在这里只收录了两本。3 本来自博士学位论文，其中一篇与前面说到的项目有直接的关系，作者在云南大学在职攻读艺术人类学博士学位。另外两篇博士论文，一篇是作者在来云南大学之前完成的，在原来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修改；另一篇的作者是云南大学教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尤其是后两篇博士学位论文，看起来似乎和研究所的研究路径不大相同，一篇关于美国电视剧的文本研究，一篇是关于英国民族政策的研究。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是丰富了我们原来的内容和视角，并且较好地体现了一种国际化的视野。

第二类是从云南大学传播学硕士点十多年来的硕士学位论文中挑选出来的，这些论文虽然谈不上完美，但在我们看来都是做得不错的论文，并且，这些论文与云南大学新闻系自 1997 年以来确立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以及后来的研究所力主的研究方向是一脉相承的。云南大学自 2000 年底获准传播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并于 2002 年招收第一届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民族与传播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方向。虽然后来学位点增加，学位点层次也得到了提升，但是“民族与传播研究”始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尽管这里收录的硕士学位论文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并且有些论文是在几年前完成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把这样一些在我们看来不错的论文集结出版，或许能够给学习新闻传播的学生们提供一种借鉴；或许还谈不上借鉴，那就

提供一个批判的靶子吧！

云南大学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是一个开放的学术平台，在这样一个学术平台上，我们几乎没有学科、专业的界限，而是围绕研究问题展开广泛的学术讨论。我们希望与国内外学术界、业界的同仁开展广泛的交流，我们也真诚地希望这个“文丛”能够得到各位有识之士的批评、指正。

郭建斌（云南大学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

2015年2月24日于昆明

目 录

绪论：民族传播——扎根田野的观察与书写

孙信茹 / 1

象征性互动：对一个傣族村寨的民族志传播研究

车森洁 / 16

交流的无奈与文化的共享

苏涛 / 104

熟悉的陌生人：旅游开发中的乡村社会关系变迁

陆双梅 / 168

特殊环境下的翁丁佤族村寨人际交往状况研究

高文娟 / 239

滇南瑶寨乡村精英的形成、维持及其演变

许筱倩 / 303

绪 论

民族传播——扎根田野的观察与书写

孙信茹

传播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近年来多有学者展开研究。一方面，传播学历来有对社会关怀的传统，发展传播学早已关注传播对农村社会的推动和带来改变及影响之传统；另一方面，面向中国现实社会的研究和理论关照，这其中固然还有传播学学科“本土”转向的驱使。无论是出于学术传统或是学科现实发展的情境需要，都可以看到，仅仅关注传播和媒介的工具性表达已然不够，从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中汲取养分势所必然。这种转向，当然也并非今日之发明，追溯“芝加哥学派开创的社区研究，探讨报刊如何促进社会秩序的整合、社区和谐及种族融合。媒介不是被孤立看待的，而是与整个都市发展、移民过程和社会秩序有相伴相生的关系”^①。无疑，今天的媒介不论在种

^① 李金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一些个人的初步思考》，载《传播研究与实践》（第4卷），2014（1）。

类上，还是在深入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也变得日益复杂和多样化。由此，将媒介、传播置于社会的整体性互动中，依然是一个不断要努力的方向。

跳出学科的讨论议题，近年来中国社会大众普遍存在的“乡愁情结”，也使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对乡村社会凋敝和传统文化消逝的焦虑及反思。如果说，1949年成为乡村社会和文化急剧转型和变化的时间起点，那么，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阶段表现为传统社会结构巨变和民族文化事象、影响力量大幅削减的时期。旧有的民族传统文化传统曾经一度没有了价值，村落内部自身的社会结构和文化遗产也发生极大改变，不少村落甚至一度丧失了自我的文化传统。伴随着社会经济整体化运行和商品经济、观念意识的冲击以及人们活动范围、交往空间的扩大，乡村社会呈现更多元和复杂的发展态势。在乡村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方式发生巨变的当下，毫无疑问，媒介和传播日益凸显其影响力量，甚至可以说，在媒介的介入和传播力量的渗透之下，城乡之间的界限进一步被打破。从乡村社会人们使用大众媒介的大致历史来看，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乡村社会中村民基本上对大众媒介的使用是较为隔膜的，村民对媒介信息的接收和节目的观看更像一种“集体性”的行为和“仪式性”的观看。这期间，村落内原本就存在的信息传播网络和沟通系统还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村落中“先富起来”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成为第一批使用大众传媒

的人，媒介使用开始表现为更加个体化的选择。而随着大众媒介的日益普及，媒介成为乡村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个阶段，村落社会和文化转型加剧，大众媒介携带着形态各异的商品消费信息和各式全新的生活理念席卷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进入 2000 年以后，随着媒介使用成本的降低，加之以电脑、手机等新媒体为主的大众传媒也开始逐渐进入乡村社会。这些新兴媒介的使用和普及，不仅能够彰显出村民个体化和多元化的诉求，更能在人们的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等层面发挥重要作用。而在社会更深的组织构成和文化内核等层面，传媒也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

由此，传播的问题和关注显然已经不是传播学者理所当然的研究领域和命题，它也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会遭遇并要面对的现实状况。也因此，在传播与社会的互动研究中，近年来关注者开始增多。其中，研究视角也各不相同，既有从宏观层面讨论社会发展与信息传播及媒介变革之间的关联性问题，也有聚焦于某个群体或某些特定区域中传媒对民族、社区文化或某个群体所带来影响的中观分析，更有从微观层面考察具体场域中人们运用不同媒介或传播对日常生活变迁的研究。无论何种研究视角，人们都注意到了传媒和传播在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愈发强大的影响力量。尤其是近年来，不少学者更提出需要重新理解传播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传播不再是介入社会生活的某个外在因素和力量，而是整个社会系统中

不可分割的一种必然要素。甚至可以讲，社会经由传播而构成。这样的研究态度，实则为传播与社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和理论背景，即传播与社会的研究，关注的更多是从传播和媒介的角度，从而探析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和变迁。

那么，为何聚焦“村落”这个实体？我们认为，对乡村社会传播与社会文化互动研究，探寻其中的发展特征及其理论意义，将研究落脚于“村落”这个具体的时空“场域”中，将有助于发掘传播活动引发的文化和社会实践。

从现实状况来看，村落是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群体。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大多认同“村落”会有特定的空间区域和大致相同的文化规范及道德信仰。因此，“村落”尤其是那些传统村落似乎常常就是相对独立和封闭的个体。但事实上，“村落就是一种场域，具有开放性、生成性和建构性”^①。作为一个开放的场域，村落必然会在各个层面与整个国家、社会发展产生互动。“村落的开放性保证了以村落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代表大社会真实的状况；而村落作为场域空间的建构性和生成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二元论的陷阱，从而使我们一步步逼近村落的真实，达到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更加宏观的理解。”^②

① 庄孔韶等：《中国乡村研究三十年》，载《开放时代》，2008（6）。

② 庄孔韶等：《中国乡村研究三十年》，载《开放时代》，2008（6）。

我们可以关注村落社会什么样的问题？在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研究者对传统乡村社会的研究议题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注“变迁性”问题；第二，关注某些“社会群体”问题；第三，关注“社会关系”问题。^①这三个层面的研究也可以为乡村社会展开传播问题的关注提供基本的观察视角。具体而言，我们做传播研究，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不断发掘：第一，从传播媒介进入乡村社会的历史脉络进行分析和寻找问题。尤其可以关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发展阶段各类传播媒介是如何与社区的日常生活发生互动的。换言之，描述社区信息传播和媒介发展的历史脉络是我们研究的基础层面。第二，从传播与社区个体、群体，村落内部与外部（国家）的互动层面挖掘研究议题。传媒力量和传播媒介对社区生活的介入，对身处其中的个体、群体造成的影响最为强烈。由此，人们会形成不同的“社会关系”与互动方式。第三，从传播、媒介和社区人群“特殊”的故事入手，发掘媒介与社区互动的典型故事及其意义表达。村落共同体形塑着人们相似的生命体验和文化共享体系，但其中的个体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突破这种限制，运用媒介和传播的力量编织出新的社会网络并生成新的活动空间。

如果说，第一层面的问题是研究者进入任何一个社区

^① 庄孔韶等：《中国乡村研究三十年》，载《开放时代》，2008（6）。

都必须完成的基本议题，那么，第二和第三个层面的研究则需要研究者“扎下根来”，把握乡村的社会规则和文化逻辑之后才能捕捉到独特的观察视角和鲜活议题。

诚如以上所说，深入具体社会情境，从而把握现象本质和展开意义阐释，其中的核心莫过于“理解”，即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始终处于一种互为主体的互动关系中，最终实现双方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因而，要达成这种理解，最好的途径和方法莫过于人类学的民族志或质性研究方法。近年来，传播学的研究除了关注传播媒介工具性和功能性的传统议题之外，更有不少研究者开始注意到传播技术对人们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形成的冲击与影响。而要理解媒介、传播与社会生活不同面向的互动与关联，探析人们围绕不同的媒介形式展开的实践活动，深入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展开观察和聆听，了解“目标社区和结构性时间的时空场景及其构成，呈现和阐释行事者行动的意义体系和结构条件”^①就显得尤为重要。

人类学民族志和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强调的是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互动关系中，通过深入、细致、长期的体验、调查和分析对事物获得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在提到这些方法时，一些学者有如此的论述：“质性研究由追求科学性、规律性的宏大叙事，转向关注

^① [美] 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康敏译，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